

保尔·朗格朗著

# 终身教育引论

An

Introduction to Lifelong  
Education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办公室

# 终身教育引论

保尔·朗格朗 著

周南照 陈树清 译

王遵仲 校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办公室

Original Title  
An Introduction to Lifelong Education  
©UNESCO 1975

责任编辑：张元一  
责任校对：黄素芬  
封面设计：李志杰

**终身教育引论**

保尔·朗格朗 著  
周南照 陈树清 译  
王遵仲 校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双桥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4.875 字数：131(千)

1985年5月第一版 198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统一书号：70220.8 定价：0.80元

## 出版说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教育科前科长保尔·朗格朗所著《终身教育引论》一书于1970年初版以来，已在国际上产生广泛的影响，被公认为终身教育理论的一本代表作。现根据1975年的修订版译成中文供读者参阅。作者朗格朗为中译本专门写了序言。

## 作者为中译本写的序

本书作者曾有双重的教育工作经历：一方面，他在中小学和大学任教多年；另一方面，他曾任职工教中心主任，在其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段时期，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秘书处担任终身教育科科长，获得了关于成人教育的坚实理论和实践知识。

正是这种多方面经验的成果与教训，使他赞同调整教育过程，并在一系列著作中提出并阐述了终身教育的原则和方针。象其他许多教育活动家一样，他认为教育和训练的过程并不随学校学习的结束而结束，而是应该贯穿于生命的全过程。这是使每个人在个性的各方面——身体的、智力的、情感的、社会交往的方面，总之在创造性方面——最充分地利用其禀赋和能力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正是通过不断的努力学习和研究，通过实习培训，人才会有更大的潜在可能性去有效地、应付裕如地迎接他一生中遇到的各种挑战。

同时，作者又认为，由各类中小学和大学所提供的基础训练，并没有使儿童和青少年为成年后所需承担的义务和任务作好充分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重要和迫切的事情是在单纯的智力活动这个狭窄范围以外，大幅度地扩展教育和培训的内容。鉴于这一目的，必须为基础训练提出新的目标，必须制定、保持和发展判断能力、思考能力、科学研究能力的方法，并且保持和发展属于每个人的、往往受到传统的教学方式损害的独特表现方式。在这种既符合个人利益、也符合集体利益的，充分利用人类资源的前景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儿童教育、青少年教育、成人教育在个性发展的完整概念中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这些观点在世界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终身教育引论》一书

被译成十七种文字出版就是证明。当作者看到他的著作译成中文出版时,尤其感到愉快。在他看来,在社会建设中已经完成并将继续完成重大变革的人民中国,对终身教育观点及其所含的改革内容表现出明显的关注是很有意义的。在未来的年代,作者和所有期望教育能有益于每个人个性和谐发展的人们,将倾注最大的努力去研究在成人教育方面能够完成的工作。

**保尔·朗格朗**

**1983年6月于巴黎**

## 原书序

本书旨在阐述终身教育思想的不断发展变化的重要意义，说明促使它产生和发展的各种力量，探讨它的涵义和内容，指出它对人类整个教育活动的影响和将会产生的后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五届大会就国际教育年向其成员国提出的十二个供思考和行动的主题之一，就是终身教育，因此，本书无疑切合国际教育年的内容。

本书作者保尔·朗格朗是成人教育方面的理论家和实际工作者，他一方面自1948年以来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成员，另一方面又通过个人的研究工作，对终身教育思想的形成和系统阐述都作出了贡献。同时，他还积极地致力于使终身教育思想为人们所了解。

书中观点系作者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观点。

# 目 录

作者为中译本写的序

原书序

前 言

终身教育探索..... 1

**第一部分 全面综述**.....19

    现代人面临的各种挑战.....21

    起作用的力量.....33

    终身教育的重要意义.....44

    内容、范围和目标.....53

    关于终身教育战略的建议.....65

    集体的事业.....77

    结论.....82

**第二部分 论证和实例**.....85

    与终身教育相联系的各项目标.....87

    内容和方法..... 100

    特殊情况：正规教育..... 114

    着眼于企业管理的学校教育与终身教育..... 123

    石头和人..... 136

    与作者的谈话..... 140



# 终身教育探索

我们在年方二十的时候，对人生怀有什么样的期望呢？首先，我们总是想度过富有意义的人生，这种人生不仅能带来生活的各种乐趣，而且能为我们提供在知识、情感、艺术和诗歌的道路上永远长进的机会。然而，我们期待于人生的又远不止于此。我们还有志于为创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这种美好，不仅是对我们而言，也是对其他人和对整个人类而言。确实，对人生的这种种希望与渴求又怎么能互相分开呢？因为当世界不少地方还有暴政和恐怖在肆虐的时候，想为自己建立一个安乐窝是既不可取，也难以接受的，这种想法甚至也不现实。下边的历史事实恰恰证明我们是不幸而言中。

那是早在三十年代的事情，文明已经濒于危机，这正好表明：我们今天听到了这么多的关于危机的谈论，并非什么新鲜事。

我们曾处于特别的困境之中。一方面，我们不能适应一个我们不能接受其目标和准则的社会；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以某种方式来避免出现更坏的情况，也就是不能让种族偏见和其他不合乎理性的东西获得胜利，不能回到野蛮状态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决不能在即将来临的决战面前袖手旁观。

我们在改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结构和条件方面所用的手段无疑是政治性的(对许多人来说全盘都是政治性的)。我们从权力、更具体地说是从关于权力的假想来考虑形势和问题。既然在一个盛行特权和到处混乱的过时社会中，障碍存在于其组织体制和机构，那么，我们能够看到的唯一办法就是改变社会。

在那个时代，人们想象只要能改变制度和机构，改变政府的性质，一切就都会好起来：坏人将被驱逐，无能的将被撤换；善良和诚实的人们将扬眉吐气，彻底根治腐败，并以良心和忠诚来治理共和国；正义将凭借新的法律和新的社会关系在个人之间和团体之间居统治地位。

经验和对那个时期的回顾很快就引导我们以新的方式进行思考和行动。的确，我们之中没有谁怀疑过、或者能够怀疑政治行动的重要意义和基本作用。它提供了战胜反对派的力量和手段，而当我们回顾现代文明所取得的最重大、最有价值的进展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它们并非智慧和理性的结果，而是由于各种政治利益和野心、各种要求和反抗互相影响和互相作用的结果。

但是，我们当中有些人在外界影响下很快改变了考虑问题的途径。虽然他们继续承认政治观念和政治活动中各种力量举足轻重的意义，但他们又不得不在展望如何建设更美好的世界的问题时考虑到一些其他的因素。他们观点的变化在于对教育的认识，更具体地说，就是对成人教育的认识。

我们也许都能同情这种观点的变化。政治行动要求简洁明确，它避免微妙的差别，也不赞成模棱两可，要达到的目标总是一清二楚地摆在那里，而人们就根据不同的目标决定支持谁和反对谁，决定自己的敌友和好坏。这种状况也许是必要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然的。许多人，也许是人类中的大部分人，都对这种分野处之泰然，但我们却不是这样。我们不能不意识到人类本性的复杂性，意识到那许许多多的矛盾，意识到深入每个人（不管他是站在哪一边）个性中的理智和愚蠢、慷慨和自私的混合。战斗的召唤可以迫使我们暂时忘却自己的真实感情，但是，一有机会，这些感情就会带着它们原有的力量重新出现。

也许正是由于我们有这种对人类情况的差别和普遍性作出反应的特质，我们才能逐步地为自己确立政治斗争目标以外的目

标。让我们把这叫作对长远利益的关心。不管一个人的生命如何短暂，它总是由无数的事件所构成，总是要经过许多的阶段。它总是有一定的时间跨度。我们不相信人一生的雄心大志可以压缩为实现某个特定的目标，不管这一目标有多么崇高和宏伟。

最后再说一下人们的不同气质、思想和观点。有些人集中注意人类现象的集体性方面，他们的兴趣全部贯注于群众，贯注于各种现实力量，贯注于组织体制和机构；他们认为重要的正是这些内容。在他们看来，个人都溶化在这些广阔的模式和概念之中。与此相反，另一些人则主要意识到以个体形式出现的人类经验。使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个人自己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生活经历，是一种意识的觉醒，是个人所特有的一整套思维方式、感情、他与自身和外部世界建立关系的方式，是他自己解决在外部和自身内部遇到的问题的特定方式，而这些方式是，并将永远是，与其他人不同的。

归根到底，在可以称作社会学的方法以及由于缺乏一个更好的术语，可以称作心理学或哲学的方法之间，有一种自然的职能分工。显然，这两种方法无优劣之分，每种方法都对我们关于人类的知识作出了不可或缺贡献。尽管如此，如果人们认为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品质、发展身体、陶冶性格，那么，应该说第二种方法在很专门的意义上是教育工作者的方法。思想、身体、性格，这些东西毕竟只能属于某个特定的个人，而个人的范围既有限也无限，既是现实的存在，又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除此而外，它们还能归属于何物呢？

如果关于不同思想、不同兴趣的这些考虑，不符合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时代促使我们得出的结论，那么，这些考虑本身就不足以使我们坚定地走上教育行动之路。在人类的历史上，至少是在世界某些地方的历史上，确曾有过安定和平的时期，但对我们西方世界来说，这样的太平盛世还不曾是我们的福分。

人们也许会把 1935-1945 这十年看作是历史上最重要、最风

云变幻的时期之一。在那个暂短的时期内，一切都濒临灾难，无论是个人的命运还是国家和民族的集体命运都危若累卵。甚至善和恶也象两军对垒，泾渭分明，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一方面是对两千年来想使人类摆脱奴役和偶像崇拜的艰苦努力的否定；另一方面是各种各样、社会地位不同的人的联盟，决心不让兽性得逞，不让愚蠢、对人的蔑视和对权力的贪欲的魔鬼联盟得逞。这里只需指出这样一点，即由斗争和牺牲、组织的力量、技术的革新以及战争的命运等汇集起来的因素在这十年的末期改变了力量的平衡，使形势有利于人们称之为“善”的方面。只要想一下如果另一方面取得了胜利，世界的命运和前途会是什么样子。在胜利对我们来说就是解放，带来的欢欣之中，我们的很多同伴认为时机已经到来，应该充分利用看起来有利于他们掌握政权的形势；他们认为，主要的目标是改造各种组织机构及其结构制度，而这一目标应比其他一切都要优先。取得控制权的手段取决于遇到什么样的反抗。自然，人们没有排除暴力和专政，即使他们并不是有意识有计划地去追求它们。

当时我们为什么没能采取这种观点呢？今天，理由据我们看来是很清楚而有力的，但在当时事情却不能使人一目了然。相反，我们当时只是听凭自己的直觉，我们更多地是从自己不能做什么而不是能做什么来提出我们的论点（我们不能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不能赞同某些狂热的感情或表示喜悦）。

在我们看来，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说明对政权进行根本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尽管这种变革看来是多么令人向往。

事实上，尽管进行了一些并非无足轻重的改革，而且也取得了若干成绩；尽管国家收入有了稳步增长，从而为许多社会部门带来好处；但无论是财政、工业还是政治，决策的权力却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而且这些人越来越不受任何监督和限制。我们远没有在自由和责任的道路上向前迈进，相反，我们在所有问题上提出咨询性意见的权利看来受到了更多的限制，而广泛听取公

众意见正是公共生活的实质所在。

我们在那时并不知道我们这个社会从那时起到现在会走什么道路。那些比我们更有条件预察未来的人也许能预见到民主的机构、道德、观念等的衰微。我们受当时的“智慧”限制认为革命不会立即发生——我们这种预测即使对了，也不会使人心满意足。

然而，我们还是由此得出了某些结论，作出了某些抉择，这些结论和抉择与工会或政治团体的不同，而它们认为必须使工人及其同盟者处于随时准备迎接决战的状态，处于战斗的或接近军人的精神状态。

众所周知，不论军人精神的根源是什么，它总是明显地趋向于直截了当和简单化。它不能容忍冗长的讨论或者主观的解释。它通过命令和指示清楚明白地表现出来。除了在策略和手腕的有限范围，不允许有自由或灵活性。它是对教条主义态度的一种肯定，从短期来看，这不无优点，但从长远来看，则会带来灾难。激进的“斗士”可以指望他们领袖的忠诚和发号施令的热情，但却不能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有关形势和动机的准确情报。

鉴于上述的个人理由，我们感到难以加入这种旗号下的队伍；但是，最主要的是我们不相信这是能够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美好生活的道路。

我们只能认为军人精神具有极为有限的价值，即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暂时必须如此。然而，当激发军人精神的外部条件不复存在时如果它仍然存在，它就丧失一切存在的理由，变成一种绝对有害的因素。在我们看来，劳工运动的领导人，尽管行动是出于良好的信念，做事也常有高尚的理由，但他们没有努力在工人中培养那种自由的探究精神，培养那种善于提出问题的、富有独创性的看法，而这类看法正是对现实和行动都采取科学态度的标志，也是对思维和存在的认识成熟的标志。由于他们对政治活动抱有一种神秘的观点，因此，他们的目标是对群众严加管理，

而其前提条件自然就是教条式的思想灌输。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还能做什么呢？按他们的说法，我们已把自己的命运和人民连在一起，但无论如何也不会和工人阶级同甘共苦；而且，虽然我们在教育程度上有起码的长处，但常常缺少人类的实际经验。抉择不是容易的事。我们可以一直保持沉默，听从命令，参加并加强维护劳工利益的阶层，这个阶层尽管处境维艰，但还是通过日常活动一点一滴地保卫劳工的利益。

这是职责的召唤。即使人们要以远不止是时间和精力牺牲来为它付出昂贵的代价，即使它意味着丧失了人的一部分灵魂，但它还是有自己的伟大之处，有自己的存在价值。有些人选择了这条道路，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有些人已经开始觉醒，这是不足为奇的。

我们没有勇气去作出这种牺牲；我们也并不认为这是充分利用我们特定能力和经验的方法。我们是职业的教育工作者；这意味着，二十年的学习、实践、会议、交往、读书、研究已赋予我们进行教学、交流思想、掌握交流语言的能力。由于爱好和职业形成的禀性，我们已与形形色色的人们建立了联系，并且不断地发展了与他们的对话和交流；而战争给了我们（如同给了我们这一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与社会背景、工作条件跟我们大相径庭的人们一起生活和工作的机会。有了这样一种锻炼和准备以后，我们觉得自己在技术上和精神上可以随时为某种教育作出贡献，在这种教育活动中，我们将能继续进行在成人中间的交流并加深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当一个人经历并实践了这样一种工作，他就会对它产生一种志趣，而这种志趣将会在他以后的一生中始终保持下来。但我们也开始感到，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工作不管怎样重要和必要，它都只是一种准备，只是真正的教育过程的一种不完美的开端。这种教育只有在成人中进行时，才能体现它的全部意义和发挥它的全部潜能。我们感到，教育的整个未

来是与建立并实施教育和培训中的这种新制度联系在一起的。

当时的形势有利于进行这样一种冒险：出于与占领军斗争的需要和机会，一大批青年人集中到我当时工作的东南部的一个小城。他们不同程度地同意我的观点。他们的出身各不相同，社会、教育、文化的背景也不一样；他们中有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有忠实的共产主义者；有工程师、技术员、几个哲学家和几个文学家。很少人已有工作，除了各自的指挥和组织经验外，他们的大多数都是“纯粹的初学者”。

总的说来，他们是异常的成熟和天真的纯朴两者兼而有之的混合体。实际上，这正是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时候，正是给人以气魄、使人羽翼丰满和充满想象力的新生和再生时期，甚至对于最不可能进行这种冒险的人和那些因性格而在那种制度中处之泰然的人来说，也是这样。

我知道，他们中大部分人真正愿意深深扎根的职业并不在教育方面，而是在技术事宜和政治方面，这一点已为后来的事实所证实。但是，作者的目的是不是写历史，这里也不是写历史的地方。我只想说，尽管这些青年在背景、工作、兴趣、哲学和政治信仰等方面各不相同，使他们走到一起来的是他们都已和教育发生了联系。

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参加了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国的抵抗运动，他们从中获得了那种独特的反抗精神，这种精神在它影响所及的一切人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抵抗运动”一词当然包含了多种多样的因素、感情和利益，它们之间有时也会发生矛盾。但是，对于那些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个运动的人来说，他们已经从中体验到两种基本的渴望：渴望改革，渴望人类的兄弟般友爱。对改革的兴趣是由以下这样一种感受激发出来的，即我们熟悉的世界正在瓦解，传统的组织体制、机构、信念、幻想和各种关系等等建成的大厦不再有任何坚实的基础，即使在那些自命为这座大厦的护卫者们的思想和良知中也已经不复存在。它也许只是一种

幻想，更确切地说有一半是幻想：虽然确实没有出现什么新世界来取代旧世界，但旧世界还是继续在衰败，继续在失去民心。我们每天每时都有许许多多的证据来说明这一点；在整个制度的裂缝中，时时发出巨大的爆炸，昭示着一种新的时代潮流将在各地出现。

然而，也有某种东西并不是半幻想，这用他们当中一个人的话来说，就是“人的汇合”。这是一个意义重大而情节复杂的长篇故事。简单地说来，这些快进入成年期的年轻人已在一起连续生活了几个月，他们已经历了多次激烈的战斗行动，但也经历了无所事事的漫长岁月的等待。当时发生的就是人们在这种形势下常见到的情况。摆脱了陈腐偏见的人们发现了一直为陈规陋习和重重限制所窒息、得不到表现机会的自身的力量和能力，从此，为生活磨蚀了锋芒的人们显露了才华的闪光，他们的个性恢复了本来面目，职业能力也得到了表现。

这三种因素——具备许多不同才能的人形成集体，激励人心的历史背景以及来自积极的社会和政治团体的一系列要求——结合在一起以后，将使我们有可能进行法国几乎前所未有的成人教育试验。我感到自己非常幸运，因为我能同这一试验发生联系，并且承担了许多职责和工作。我曾负责建立并管理一个职工教育中心，办公室就设在工会办公楼内。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培训工会负责人，同时，通过较为一般的方法为在抵抗运动中形成的新社会机构培训领导人员。因此，我们的工作有明显的实用倾向，这是环境使然，而且这种倾向适应一种理论，这种理论是我们大家在有时间进行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有时间进行实验的那个时期或多或少为自己设计出来的。我们认真地考察了法国所谓的大众文化的历史上取得何种成就，决心走完全不同的道路。

在我们看来，激发过去几代人热情和活力的大部分活动所具有的弱点和由此而来的经不起挫折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由于理论上的错误。我们的前辈一直是传统文化思想的奴隶，他们



囿于旧观念，到头来就难免失败。他们把文化看成是自成一体、是一个独立的领域，认为它就是人类历代积累起来的知识总和，是科学、艺术、文学等各部门经验和成就的总和。既然它是一个领域，那么，人们既可以进入这个领域，也可以留在这个领域外面。人们一旦进入了这个领域，就可以靠机会并根据所受教育的类型、爱好和兴趣在这个领域或多或少地占有一席之地。有些人可以成为历史家，有些人可以成为地理家，其他人可以把数学、文学等等作为自己的专长。

如果人们在文化上采取这样一种“地理的”观点，那么，很显然，过“有文化”生活的机会很不平等。有文化上的富人和穷人，有文化上的享特权的人和牺牲品，有学到了知识的和没有学到知识的；有受完小、中、大学教育、学会了思想交流的方法和语言的人，也有知识材料和工具十分有限的人。

人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这些情况下，一代又一代地致力于为平民服务的教育工作者只有一个主要的目标：缩小不平等，广开大门，拓宽通向文化的大道。这样，他们就把自己看成是复杂的（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也是编码式的）知识体系的销售者。要推测我们持批判态度的理由和基础将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我们一方面承认，他们的意图是高尚而令人尊敬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在这种态度和方法中看到一些谬误之处：对知识和文化的本质在认识上的谬误；把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化经验的具体模式当成文化本身的谬误，而在这个特定的情况下，把资产阶级在几代人的时间内形成的思想方式、生活方式和情感强加于社会其他阶级的谬误。后者不能从对他们的说教中认清自己，因而只能作生活的旁观者；要不然，如果他们被资产阶级的某些说教所迷惑，那么，他们从文化的丰盛筵席上得到的也只能是一些残羹剩饭。总之，这种使工人接触文化的尝试在指导思想上就是错误的，因而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们对文化和文化生活有着不同的认识，这种认识激励着我